

季羨林 饒宗頤 主編

華 林 博 士 文 庫

9

敦煌變文寫本的研究

[日] 荒見泰史 著



中 華 書 局

華林博士文庫 ⑨

敦煌變文寫本的研究

[日] 荒見泰史 著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敦煌變文寫本的研究/(日)荒見泰史著. - 北京:中華書局,2010.11

(華林博士文庫)

ISBN 978-7-101-07532-8

I. 敦… II. 荒… III. 敦煌學-變文-文學研究-中國 IV. I207.6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147916 號

書 名 敦煌變文寫本的研究

著 者 [日]荒見泰史

叢書名 華林博士文庫

責任編輯 石 玉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

版 次 2010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規 格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張 10 $\frac{3}{4}$ 插頁 2 字數 280 千字

印 數 1-1500 冊

國際書號 ISBN 978-7-101-07532-8

定 價 28.00 元

華林博士文庫編輯委員會

主 編

季羨林 饒宗頤

編輯委員

王邦維 葛兆光 湛 如 陳 明 李四龍

主辦單位

北京大學東方學研究院 南開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中心

總序

季羨林

“博士”一名，古已有之，幾個朝代都使用過，指的是一種官名。現在我們使用的“博士”，則是舶來品，是英文 doctor（其他德、法等語也一樣）的翻譯，舊瓶裝新酒也。

歐美的教育制度，頗多不同之處。僅就我比較瞭解的德國而言，那裏不大有“畢業”這個概念。一般的情況是，一個學生經過小學、中學、大學十幾年的學習，最後在一個大學安定下來，選中了一個教授，參加了他的討論班，最後被教授認可，願意收為弟子，於是給學生一個題目，由學生自己去作。再經過幾年時間，論文完成，教授同意，於是確定時間進行答辯。答辯的範圍共有四個：論文本身，一個主系和兩個副系，共有教授三人。主席照例是文學院長，因此答辯委員會一般都由四人組成。委員們巍然高坐，有如法庭。學生是審問對象。教授提問有極大的自由，上天下地，蒼蠅蚊子，無所不可。聽說漢堡大學一位中國學生以漢語為副系，不過圖省力而已。結果教授問：莎士比亞和杜甫誰早？學生答曰：莎士比亞。教授莞爾而笑，說道：“候補博士先生，對不起，你落第了。”我又聽說，十九世紀後半葉德國醫學權威 Virchow 在學生答辯時，捧出了一盤豬肝，放在桌上，問學生這是什麼。學生遲疑了半天，不敢答覆。最後教授說：“這是豬肝。”學生說：“我也看着像豬肝。但是答辯會教授先生怎麼能拿豬肝出來呢？”最後教授說：“你做不了真正的科學家。既然認定是豬肝，為什麼不敢說出來呢？”類似這樣的故事，我還聽過很多。你從中可以悟出來研究學問的道理。

至於博士論文，這當然是獲得學位的主要根據。這是一個學子展示才華、顯露鋒芒的最佳的地方。德國教授對論文的要求不算太低。一篇論文必須有點新東西，有點原創性。原創性當然有高低之別。但是，不管是高是低，你必須有，則是不可逆轉的要求。否則東抄西抄，下筆萬言，也只等於一堆廢紙。德國這一點小小的經驗，很值得我們中國學習。

我們中國實行博士生制度，不過只有二十來年的歷史。但是，一實行，首先就碰到攔路虎，這一條虎就是教授膨脹。據報載，一個大學裏的一個系共有七十名教員，其中有六十八位教授。這是否是事實，我不敢說。全國教授的總數，我也不知道，反正其數量是極大的。每一個教授都招博士生，勢所不能。於是某一些人又充分發揮了創造力，製造了博士生導師，簡稱“博導”這樣一個詞兒。博導評審權最初掌握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手中。後來授權幾個大學自己評審，於是出了一個匪夷所思的笑話。某大學某系論資排輩，某教授應該擔任博導了，而該教授此時正想寫論文投到某一位博導門下當博士呢。

笑話歸笑話，我擔心的是博士論文的品質。近十幾年來，我讀的博士論文不多，總共也不過三四十篇。總的來看，品質當然會是參差不齊的，但是其中頗多優秀之作。這證明了我們實行博士生制度是成功的，對推進學術研究起了積極的作用。

對博士論文的作者這一羣博士們來說，至關重要的問題是論文的出版。試想一個青年人坐着冷板凳，開電燈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好不容易製造出一篇論文，結果只有幾個人看。他們鬱悶和失望，不是很自然的嗎？但是，出版又談何容易。哪一家出版社也不肯斥巨資出版很難有銷路的博士論文。十幾年前，海峽對岸主持文津出版社的邱鎮京教授鼎力相助，在大陸同仁的協助下，賠錢出版“大陸文史哲博士叢刊”，出了百餘種後，無法持續下去，只好停刊。我個人認為邱教授這種善舉實在是功德無量，將永遠銘記

在我們心中。

現在這樣功德無量的善舉又有人開始運作了。這是由兩個機構共同促成的，一個是上海龍華古寺的“華林獎學金”，一個是北京的中華書局。這真是天造地設的好搭檔。同這兩個機構我都有誠摯的友誼。上海的龍華寺，是一座佛教千年古剎，住持法師操行冰霜，寺管會副主任王永平居士清明朗照，他們多年來關心當前我國人文科學的發展和研究工作，出版《華林》學術輯刊，舉辦學術講座，在北大等高校設立“華林獎學金”，不能不令人感到由衷的敬佩。北京中華書局一身正氣，我曾幾次稱之為“中流砥柱”，中華不出一本壞書，在出版界是難能可貴的，這非砥柱而何？我希望這砥柱不被蛀蝕而愈加堅固。在促成這一番功德無量的事業中起重要作用的幾位朋友中，有幾位我們無論如何也不應該忘記。“華林”方面是湛如博士，沒有他的努力，這一件事是成不了的。中華書局方面則是書局領導及漢學室的幾位編輯，沒有他們的支持，這一件事照樣是完成不了的。王邦維教授也做了許多推動工作。對以上幾位朋友，我必須表達我最誠摯的敬意與感謝。

由於衆所周知的原因，我們還不能把所有的博士論文都納入我們的文庫中。我希望，年輕的博士們，不管你的論文是否已經納人文庫，都要更上一層樓，鍥而不捨，繼續鑽研，以便取得更新更大的成績。你們都不要忘記李商隱的詩句：“桐花萬里丹山路，雛鳳清於老鳳聲。”你們要亮出你們清越的鳴聲，與全國人民一起共慶升平。

2003年1月23日

序

陳允吉

蓋聞茂林翳薈，則驚鳥雲從；巨壑滹含，則靈鱗競赴。斯近俗謠，可施廣喻，況諸爲學區間，於理誠一如也。

夫敦煌掌控岐隴，襟連瀚海，光昌華表，譽滿宇寰。播漢唐之盛韻，弦管紛繁；集夷夏之珍稀，奇瑰畢至。風土殊異，擁綠洲而繞戈壁；景觀特絕，垂翠柳而枕甘泉。指顧率當衝要，玉關陽關；鼓吹以迎遠來，西亞南亞。絲路演文明之互動，靄霄振昭德之回音。瞻爾山麓窟羣，嘆其閭浮罕匹，薨戶星羅，楣龕櫛比。塑像熙怡，似印心於妙契；罽圖詭幻，恒託跡於微茫。泊乎王圖錄禮懺住寺，平居穿甬，閤室頓開，故書驚現。隔代封藏，終慶一朝覲面；曩時閉卷，將持萬計稱量。爰及變文，暢傳疇昔，出帙夥頤，具形彬備。由此中外通人，探求聯袂；遐邇學者，騰踴預流。掇校遺叢，期毋違乎信達；磨瑩几案，俾務際於精詳。試舉向孫王潘數公，倉石那波諸宿，克偕引領高驤，奮迅以孚衆望；栽培後進，力耘以爲標程。是以芬薰河潤，澤習周被；少輩才穎，思齊共勉。擇其歸趨，貞其職守，芄芄然若嘉禾吐穗，鬱鬱乎猶喬木貯蔭。按究治變文界域，曜榮蔚跂若茲，且尤適宜隱秀弱齡之嗣興繼起，固非獨系材料資儲之優勢，亦其大環境甚多因果相參推轂所致者焉！

荒見泰史君，東瀛恪勤士也，漢文教席世家，曹洞禪門龍象。幼服惇行，謹銜庭訓；躬承素藝，用副父懷。緬善修之懿範，輒欲響

應；諷古哲之規箴，旋增默識。轉而庠序列名，受業於金岡上座；泮宮汲綆，沉耽乎俗講變文。師遽仙升，肅膺囑累，愈堅銳討，驅役夢魂。願葦航以濟海，目極鷗波；思沙嘯而俶裝，心馨花雨。值辛未秋始抵滬城，甫踐訪研之旅；止依復旦，並牽磋切之緣。過吾蓬廬，移陰摯話，紹酒留賓，鱸魚享夕。訝涉趣何差同，喜審交已莫逆。自茲以降，常渡滄溟，晨發八王子，午登五角場。客游京國，諮闕下之舊耆；造覲敦煌，閱院中之編筴。脫略塵囂，敬崇懋碩。親入谷之溫溫，屬謙言江廈；靚選堂之奕奕，方豫附韓山。久嘗付意遍稽寫本，讎正槧刊，條辨典文制式，叩梳宣唱儀軌，既定之爲課題，乃挈之以攻博。樹徵實之論，棄憑虛之談，存真祛蔽，竟委窮源，判斷每返經三覆，證據必兼敘兩重。排嫌剖滯，決疑難益進其能；苦體勞神，臨睨乏靡捐其志。倍歷艱辛，屢屏營於裁奪；彌綿歲月，卒綴葺而敷章。前賢尾上先生，勛勵有加；內助桂弘女史，酌斟罔倦。迄躋辛巳暮春，順利完成答辯。由其悉傍原件，匯攝新知，與會尊長同申首肯，咸予頷評。今荒見君籌劃賁往鐫刻，即以作弁附余。余學非專篤，辭惟粗疏，欣厥事之足彰，感逝年之堪憶，聊述籬窺偶得，冀充芹獻陳詞云爾。

2006.年元月

於江灣復旦宿舍蕉葉梅花行館

導 言

本書以敦煌寫本爲變文研究的原始資料，重點闡述了筆者對變文的看法。

首先回顧了敦煌文獻尤其是變文研究的歷史過程，對中、日前輩學者們的學說作了一番簡介和討論。筆者深切地感到目前學術界關於變文的定義仍處於混沌狀態，與學術界偏重於講唱體文獻的研究風氣，從而忽視講唱體以外的例外文獻的研究不無關係。實際上，講唱文藝的相關文獻不只局限於講唱體文獻（序論部）。

筆者除了利用已被校錄過的變文資料以外，還收集整理了寫本的影印件作爲原始資料，重新校錄了那些具有變文題名的寫本資料，在參考前輩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嘗試做新的探討。筆者認爲變文按文學形式可分爲三種體裁：講唱體、韻文體和散文體（故事略要本），其中散文體故事略要本是筆者第一次提出的概念。這樣確定了作者研究變文的範圍，且有利於解釋變文研究中至今尚遺存的一些問題。

筆者的主要研究方法還是重視精讀敦煌的原卷資料，主要理由有如下兩點：

第一，敦煌資料中還有許多未整理、未解讀的文獻，其中有不少有關講唱文藝的資料存在，有的寫本甚至連《敦煌遺書總目》上都沒有介紹。筆者認爲，將這些寫本整理使之體系化，對變文、講唱文學發展研究很重要。比如，有的文體裏有摘要故事的斷片記

載，筆者以前在東洋大學金岡照光教授的指導下，從事過東洋文庫所藏的斯坦因、伯希和文獻照相版資料二萬五千張的整理、目錄化工作，在整個過程中，一張一張地翻閱照相資料時，發現有不少摘要佛經或類書而成的摘要故事的記載，有的只摘錄一篇，有的連着寫幾篇故事；有的寫在其他記載背面，可能是利用廢紙寫的；有的寫在其他文學作品的後面。這些記載的用途模糊不清，對這類寫本的研究沒有得到許多學者的重視，所以以前的目錄上頂多寫有被摘要的原典書目，沒有注釋，有的連題目都未寫。筆者通過對這些文獻的收集、整理和研讀，開始逐漸解明了一些文獻和講唱體文獻、變文、俗講的關係。具體而言，有的用於俗講儀式上；有的是作為講唱文藝上略要底本的用途來使用的；有的用作寫作變文時的參考筆記等等（本論部第二章）。對這些講唱略要底本的相關寫本的研究，以前基本上被忽略了，這點是只有在查閱原卷資料時才能有所發現的。這是筆者認為要重視原卷的理由之一。

第二，可以指出只看校勘資料時的局限性。目前已經公開的校勘資料實在很方便，短時間內能比較容易地閱讀大量的文獻記載。有的還帶有很詳細的注釋，所以普及很快而且影響力很大。但是校錄本的記載和解釋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一般都是根據編者的側重點來編輯、校錄，有時也有可能脫落寫本上重要記載的情況。在此再舉一個例子，是關於“悉達太子成道”的故事。有關“悉達太子成道”的故事，除了經典原典以外的敦煌寫本裏，講唱體有十六件，韻文體有六件，其他散文體六件，如果“降魔”故事也算在裏面的話就更多了，可以說，當時對這個故事的講唱活動是很頻繁的。通過對這些寫本的比較，能夠看得出的有意思的地方是，上述二十幾件不同文體的寫本之間在詞彙、描寫上具有共同點，有的好像是原典和抄本之間的關係；有的五言韻文被改為七言韻文；有的地方把韻文改為散文的一部分來用；有的把長篇韻文剪短改為押座文來用；有的加上韻文；有的加上講唱人的口氣和套語等等，這

些是考察講唱文學作品的發展和實際使用時候的重要資料。各個寫本之間的内容、描寫、使用韻文的不同之處，能使讀者感受到當時真正講唱時使用底本的情形以及臨場的氣氛。但是，在校錄資料上因為有編輯上的限制，只能拿出講唱體類型的文獻來整理歸納校錄，所以通過校錄資料來查閱該作品的時候，沒有查閱原卷寫本時候的感覺，感覺不到講唱底本資料的全面貌。況且講唱體文獻以外的文獻連校錄資料都沒有，只好查閱寫本了。這種問題也是筆者重視原卷資料的理由。

第三，通篇看一件寫本的時候，可以感受到：同一寫本上間斷的不同段落之間貌似無關，其實互相之間有着密切的關聯。有一類在唱導、講經等的口頭表演的場合上作為底本、文本而用的寫本，一個寫本上可能寫有佛讚、願文等韻文或散文，有時還抄錄有各種經典的摘要，用作備忘小貼士。比如，在本稿裏被經常提到的敦煌本《佛說諸經雜緣喻因由記》，以前被認為僅僅是並排寫有幾條故事的寫本，但經過仔細考察發現，原來後面寫有的《莊嚴文》、《俗講儀式次第》也是《佛說諸經雜緣喻因由記》裏的一部分，而通過對此寫本的分析，我們了解到了不少當時口頭表演場合的情況。如果只通過研究校錄資料的話，恐怕是難以發現和體會的。

總之，如果有條件能夠查閱唐末五代到宋代的講唱文學原卷的話，那麼廣泛地搜找有關文獻、仔細地查閱原卷資料，儘管耗時費力，但我覺得是應當應分的事情。

據此，筆者收集到不少類似體裁的寫本資料，並具體討論了其特徵和功能（本論部第一章）。

筆者認為特別重要的不只是講唱體變文、講唱體緣起，另外還有記在這些講唱底本資料周圍大量存在着的文獻，就是剛才所說的摘要佛經、類書而成的故事略要文獻。在此說“周圍”，是因為通過調查研究後現在能夠證明，很多這類略要本與變文、講唱體緣起

等文體有發展、援用的關係，比如：S. 389、P. 2621 和 S. 4654 是同一系統的略要文獻和韻文記載，後來都拼起來改寫為 P. 2721V《舜子至孝變文》等變文作品；摘要《賢愚經》後再被改寫而成的 S. 4464 略要故事寫本，其內容再被摘錄，成了《八相變》、《悉達太子修道因緣》、《太子成道經》的開頭部分；其他還有摘要《法苑珠林》故事部分的北京 8407 上有《頻婆娑羅王后宫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的略要；另外還有記伍子胥等歷史故事的略要寫本（本論部第二章）。從用途上來說，P. 3849V、北京 8416 都是內容相近的略要寫本，故事後的歸願文部分，可以證明它們在俗講儀式上被使用的事實；另外，P. 3096 略要本上留有如何在儀式上使用的注釋。從作品的形式上看的話，還有變文《劉家太子變》那樣類似於略要體形式的變文作品。因此從各個角度來看，筆者認為這些故事的略要體稱為變文的“周邊資料”應該是妥當的。

筆者在本書裏把這類寫本暫時概括為“故事略要本”的名稱，並嘗試在講唱文學研究中作為資料羣，使之體系化。然後探討包括這類周邊資料在內的當時講唱文藝活動的面貌和講唱文學作品的實際發展情況。

在本書中筆者證實了一部分故事略要本和講唱體一樣，在佛教的講經、俗講中有綱要底本、話本的用途，從而能夠考慮兩者之間的演變關係；通過這些故事略要本寫本的寫成年代分佈略早於講唱體，據以推測故事略要本是講唱體作品形成的素材或筆記資料，這段時期大約在九世紀後半至十世紀，當時正值唐王朝勢力衰退乃至滅亡、佛教進一步通俗化、通俗講經盛行的時期，在此期間內寫成的故事略要本和講唱體變文寫本相當集中，數量最多。

筆者認為：講唱體變文，以當時佛教講經中的因緣譚、譬喻譚、孝子譚等口頭文藝為基礎，結合講經儀式（各論部），將略要底本、韻文資料糅合在一起，於九世紀末至十世紀漸漸成形的可能性很

大,到十世紀進入全盛時期,其原因之一與敦煌曹氏歸義軍時代安定繁榮的政治局面有關。

筆者還認為,敦煌文獻裏所看到的由於講唱文藝活動的需要,把經典、類書的略要本慢慢改編為長篇文學作品等等一系列現象,對考證說話、話本、小說的發展演變是很有啓發性的。

目 錄

序	陳允吉 1
導 言	1

序論部 敦煌文獻和變文研究回顧

敦煌文獻和變文研究回顧	3
一、變文是什麼	3
二、敦煌文學文獻的研究史	7
三、講唱體文獻引人注目的原因	12
四、講唱體文獻的總稱——變文	17
五、從文體論討論的變文	18
六、小 結	20

本論部 敦煌變文及其體裁

第一章 變 文

——敦煌變文研究概述以及新觀點	23
第一節 敦煌變文研究概述	23

第二節	現存題名變文的文學形式	33
第三節	題名變文文體詳說	42
第四節	現存變文與繪畫的關係	55
第五節	小 結	60
第二章	敦煌的故事略要本與變文	62
第一節	何謂故事略要本	62
第二節	故事略要本研究概說	66
第三節	故事略要本的具體例子及其特徵—— 《衆經要集金藏論》	69
第四節	敦煌的故事略要本目錄及年代	73
第五節	故事略要本與唱導、講經、俗講	95
第六節	故事略要本和變文	102
第七節	小 結	106
第三章	敦煌的講唱體文獻	107
第一節	敦煌的講唱體文獻	107
第二節	講唱體文獻的分類	108
第三節	講唱體文獻的特徵和講經	184
第四節	講經儀式的程序	187
第五節	講唱體文獻成立的年代	195
第六節	九世紀通俗講經的底本	198
第七節	小 結	201

各論部 佛教儀式與變文的關係

第一章	九、十世紀的通俗講經和敦煌	205
第一節	九、十世紀的通俗講經	205
第二節	吐蕃占領時代的文化交流	208

第三節 小 結	214
第二章 敦煌本“莊嚴文”初探	
——唐代佛教儀式上的表白對敦煌變文的影響	216
第一節 前 言	216
第二節 莊嚴與變文	222
第三節 莊嚴文和 P. 3849V 記載	223
第四節 莊嚴文及其在佛教儀式上的作用	229
第五節 莊嚴文和講唱文學	235
第六節 小 結	238
第三章 押座文及其在唐代講經軌範上的位置	240
第一節 對押座文的研究	240
第二節 敦煌的押座文寫本概述	243
第三節 唐代講經軌範	256
第四節 作梵與押座文	261
第五節 小 結	280
附錄 P. 3849V《佛說諸經雜緣喻因由記》	282
主要參考文獻	303
後 記	319